

# 将“一带一部”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 核心提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带一部”的区域定位,将湖南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嵌入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之中,指明了湖南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全局性要求,提升了湖南的战略地位,拓展了湖南的战略纵深。将“一带一部”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全局下行动。

刘友金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区域协调发展,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把握其中蕴含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区域发展脉络中的湖南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发展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形成了从“均衡”到“非均衡”、到“再均衡”、再到“协调发展”的战略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沿海内地产业空间布局的均衡化。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我国采取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党的十八大,采取了以“四大板块”为支撑的“再均衡”发展战略,形成了在区域发展中由效率优先逐步转向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本战略思路。

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亟待加快补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作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13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由“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升为“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大战略。

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湖南得益于“三线”建设,一大批军工项目、民用和基础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全省工业整体实力得到快速增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发展重点和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湖南不沿边也不靠海,

不在东也不在西,因而原有发展优势消减,导致较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相对缓慢。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依托区位优势有所起色,但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定位仍然不太明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指明了湖南“一带一部”的区域定位,明确了湖南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使命任务,湖南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由此拥有了总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将湖南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嵌入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之中,指明了湖南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全局性要求,提升了湖南的战略地位,拓展了湖南的战略纵深。

##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独特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赋予全新内涵,注入鲜活动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升级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的战略功能,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大城市群战略,构建了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经济带,完善了国家级新区、综合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多层次的战略支撑平台,开创了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有其独特内涵和要求:一是区域协调发展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各地资源禀赋迥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国来说,区域协调发展不能齐步走,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协调发展模式。二是区域协调发展要全国一盘棋。区域协调是一项全局性的系统工程,要通过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做到整体合作、个体竞争;根据各地条件梯次推进,做到合理分工、以强带弱。三是区域协调要坚持开放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要树立全球战略意识,通过打通内外循环,将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相结合,产业的本地布局与全球产业链重塑相结合,以国际区域合作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区域定位,是对湖南如何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作用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求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在国家区域总体布局中重构湖南发展新坐标,更好地凸显湖南地位,构建湖南发展综合比较优势,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二是要从讲政纲讲大局和全国“一盘棋”的高度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与已有的国家区域战略紧密融合、无缝衔接,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找准湖南特色、发掘发展机会、体

现湖南担当,防止游离与脱节。二是重点做好过渡带和结合部的大文章,在承接东西、融通南北中找准区域定位,擦亮区域特色,谋划区域战略。通过加强对内和对外开放,在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和参与全球竞争中提升湖南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

## 立足“一带一部”的战略谋划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形成了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新理念。一是系统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惯性思维,以城市群、城市圈、经济轴带的建设破解行政区划束缚,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内流动和整合。二是绿色发展理念。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扩展到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三是全球治理理念。将“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区域协调体系,建立了区域协调的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形成面向全球且国内国际相互联通的区域协调发展开放体系。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区域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目标要求。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与归宿。

新征程上,湖南如何锚定新坐标、谋划区域发展新格局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在大局下思考、在全局下行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厚植“一带一部”优势,以一域之光为全域添彩。

加快陆海空立体大通道建设,优化“一带一部”战略连接线。重点是进一步打通向东、向南、向西的铁路通道,开通岳阳至香港、日韩、东盟等国家(地区)的直航和接力航线,推动湖南与中国-东盟经济走廊和北部湾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东南沿海地区、成渝地区的对接。全面统筹规划建设中欧班列、城陵矶港口、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等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建设,锚定新坐标、塑造新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更大力度推动对内对外开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以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为重点,将湖南打造成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为重点,将湖南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腹地。统筹推进湖南自贸试验区、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三大国家级开放平台建设,打造湖南具有活力和特色的开放平台。

携手谋划产业对接新空间,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将“一带一部”区位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根基在实体。以沪昆高铁经济带作为对接长三角的主纽带,以京广高铁经济带作为对接京津冀和粤港澳的主战场,以渝长厦高铁经济带作为对接成渝和福建沿海的主阵地,与周边省份共享创新资源、共探技术难关、共促产业合作、共建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共探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带动中小城市建设,确保省内各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6阶段性成果)



熊辉

去年下半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习俗”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为茶文化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可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推进茶文化国际影响力。

## 促进茶类非遗繁荣发展 普及传承茶文化

强化主体意识,明确责任担当。茶类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协同合作,组织民众广泛参与,尊重文化传播规律,制定茶文化传播政策。茶类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制茶技艺及其习俗的传承人,他们的责任是传承茶文化与传统制茶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主体是专门从事非遗传承提供各种组织、管理、服务的各级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各类商业组织、新闻媒体以及民间社团组织等。政府部门的责任是保障茶类非遗组织管理、政策法规制定、资金运作等。学术界要积极梳理茶类非遗文化的源流,为茶类非遗文化保护与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商界要尽快推进茶文化与旅游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各级新闻媒体机构,肩负着传播普及中国茶文化的责任。民间社团组织要积极促进茶类非遗文化的自主传播、良性发展。

多措并举,保障茶类非遗文化普及与传承。各个产茶区要结合地方实际,依托各级茶类非遗传承基地、茶企与茶农,实施茶农“拜师学艺”计划。组织非遗专家学者编写区域茶文化艺术、茶技与茶俗等非遗传科普及图书。学校与企业事业单位要联合传承人持续开展茶类非遗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在高校开展茶文化研究、茶艺、茶道公开课,在职业院校开设手工制茶专业,培养既掌握传统制茶技艺,又擅长机械化操作的制茶专门人才。在中小学开展茶文化研学和沉浸式采茶制茶体验营,通过开设可玩、可游、可吃、可住、可赏的茶类非遗体验活动普及传承茶文化。

## 丰富茶类非遗文化内涵 促进茶旅全过程融合

深入茶文化研究,丰富茶文化内涵。茶文化研究既应有茶学、史学、文化学的视角,以满足茶文化推广;又应有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的情怀,将茶文化纳入人类生活史的整体历史进程中,以夯实其根基。鼓励茶文化研究团队,深入我国四大主要产茶区,调查发掘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茶史、茶技、茶俗、茶具、茶歌、茶故事等茶文化资源,并把它们应用于茶旅融合的全过程。可在全国大中型城市恢复建设一批老茶馆,在重点城市逐渐把茶馆文化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茶文化建设成城市的文化品牌。

合理利用茶文化遗产,促进茶旅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大茶叶产区都建设了一批国营茶厂,它们传承保护了中国茶文化基因,培养了制茶非遗传承人。安徽省舒茶镇的“九一六”茶园,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后修建的,现已成为省级非遗舒小兰花的核心产地与重要的红色茶旅文化遗产。湖南安化茶厂等早期建筑群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可利用这一遗产打造全过程生态茶旅文化小镇,建设茶文化主题酒店、茶文化博物馆、茶文化亲子馆,开展茶艺培训与茶道表演等让游客吃有茶宴、住有茶院、游有茶园、行有茶山、购有茶礼、赏有茶歌、娱有茶戏、梦有茶景。

## 加强茶文化数字传播 提升中国茶文化国际影响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茶文化源远流长,做好茶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利用数字与智能媒体技术,促进茶文化数字传播。非遗数字化传播已然成为文化传播的趋势,可利用VR、AR等现代数字媒体虚拟技术,还原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的相关流程,再现中国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海上茶路等茶文化交流活动。开发茶文化数字游戏产品,扩大中国茶文化的传播渠道,让全球互联网用户参与中国茶文化的互动交流。

利用社交媒体、视频直播等平台,加强中外合作。联合YouTube、推特、Facebook、B站、豆瓣、抖音、快手等国内外知名新媒体平台,开展中国茶文化推广合作;在茶文化内容方面,加强对中国茶叶典籍的外译,由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内外茶企、学术文化机构,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政策资源,走出国门举办国际国际茶文化节,精心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茶文化节活动,如斗茶会、祭茶节、茶歌赛等。

【作者系安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皖西学院基地讲师。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皖西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研究”(AHSKQ2019D101)成果】



## 漫谈

# 人文：文化的本质

陈仁仁

先秦经典《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化”和“人文”这两个概念最早的出处。“文化”即人文化成。可见,“文化”这一观念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文”是“文化”的内核与本质。就其词义而言,“文化”本是一个动词,是指用“人文”来感化天下,从而使得群体能够都依“人文”行事。依人文行事,就是文明的行为,否则就是野蛮的。所以《周易》还说:“文明以止,人文也。”

如果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文化,那么文化应该具备如下两个根本性特征。

其一,文化有群体性,是用于维系某个群体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力量。

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就是指天下所有人,“天下”的视野,是古人的一种文化理想。他们总是希望某种好的东西为天下所有人共同拥有。所谓“一道德,同风俗”,也有这一重涵义。随着文化交往的扩大,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存在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差异还真不小,甚至相冲突。

虽然“天下”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类型,虽然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有差异甚至冲突,但是任何人一定是处在某种文化类型之中,某种文化类型一定可以约束某一文化传统中的某一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体都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载体。文化传统由个体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个体正是在传承和发展某种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来认同和融入某一群体。人类个体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群体要把个体凝聚起来,从根本上说靠的都是文化。

现代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对“文化”有自己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由此可见,在梁先生看来,文化是属于民族的,文化具有民族性。这是从文化类型这一宏观意义上来说的,中国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西方有西方民族的文化。若从更具体的视角来看,任何群体都可以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特征。

其二,文化是属“人”的,既不属“神”,也不属“兽”。文化作为群体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能维系某一群体的存在与发展,而维系群体的生活方式却不只一种。本质上或者狭义上,只有“人文”的方式才能说是“文化”的方式。

西方的文艺复兴反对的就是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它要把人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此时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是要肯定“人”而非“神”是世界的中心。我国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以人文的方式来组织社会,对抗的是商朝的神鬼统治。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孔孟儒家以道德复兴人文,而儒家道德说的一个根本生点是“人禽之别”。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的人文是对“兽性”的反抗。

我们说,文化的内核与本质是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人有神性或者兽性。如果所谓“神性”,指的是人具有某种超越性;所谓“兽性”,指的是人具有某种自然性,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人的超越性和自然性,都必须以人性为依归,以人文的方式加以组织和约束,它才能是属“人”的,才能帮助人及其群体的存在和发展,而不是毁灭。

所以,只有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实现就是“人文”的发现和自觉的过程,就是实现人自身完善与发展的过程。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教授)

# 推动红色音乐经典 展现新活力

何吉多

歌曲是时代的心声,一曲红色歌曲就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湖南是伟人故里、红色热土,在建党百年的峥嵘岁月中产生了极具地方特色的红色音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艺术化的方式对“四史”进行记录,对家国情怀进行讴歌,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方式,将带动更多人铭记光荣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湖南的音乐名家坚持正确政治导向,为人民创与作,为革命鼓与呼,为时代歌与咏。抗战年代,长沙人田汉作词、《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至今响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邵东人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之歌》《全面抗战》《上战场》《弟兄们拉起手来》等充满战斗热情的歌曲,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沙人黄源洛创建海军文艺团,创作了歌颂人民军队丰功伟绩的《八一大合唱》、歌剧《战台风》、歌曲《我曾战斗过的地方》《海岸炮兵之歌》等和多首管弦乐曲,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海军。《浏阳河》《挑担茶叶上北京》等,更是唱出了湖南家乡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改革开放以来,《小背篓》《辣妹子》《八百里洞庭美如画》《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等则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三湘大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湖南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崭新精神风貌表现得生动传神。

不同时期的湖湘红色歌曲体裁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号子、田歌、小调、民歌,也有儿歌、风俗歌、牧歌、船歌、渔歌、叫卖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大多数歌曲创作手法简洁大气,语言通俗易懂。《马桑树下搭灯台》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土家族民歌,形成于明代,后经贺龙元帅的堂弟贺锦斋改编,用最委婉的曲调和最质朴的语言,展现了一种朴实深厚的爱情观,更是融入了坚贞不屈的红色基因。炎陵红色歌谣大多源于客家山歌,以五声徵调式和五声羽调式为主,采用传统的比、兴、赋表现手法,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早的红色根据地革命民歌《插牌分田歌》等。

湖湘红色音乐经典在风云激荡中产生,在不同

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风貌,发挥不同的作用。今天,湖湘红色音乐经典依然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文化之“根”。我们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重塑红色音乐的艺术形态,重构红色音乐的表现形式,现实题材创作音乐,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湖湘气派的优秀音乐作品。不断开拓新的艺术样式,推动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音乐与传媒的融合,音乐与科技的融合,借助湖南广电、出版、网络等优势头部平台,推动湖湘红色音乐“走出去”,抢占主流舆论阵地,提升传播力影响力。

创作精品,打造文艺新标杆。湖湘红色音乐文化底蕴深、基础好,逐渐形成了“音乐湘军”文化品牌。立足新时代,要继续发扬“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组织实施音乐文化领域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创作工程,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湖湘气派的优秀音乐作品。不断开拓新的艺术样式,推动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音乐与传媒的融合,音乐与科技的融合,借助湖南广电、出版、网络等优势头部平台,推动湖湘红色音乐“走出去”,抢占主流舆论阵地,提升传播力影响力。

丰富载体,打造湖湘新品牌。文艺只有不断走进人民,才能真正发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作用。湖湘红色音乐文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完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常态化机制,开展“欢乐潇湘”“雅韵三湘”等群文品牌活动,建设“红色音乐文化博物馆”等公共文化阵地,引领社会风尚,为人民群众提供丰饶的红色精神食粮。

面向市场,构建发展新机制。打通红色音乐创作、录制、出版、复制、发行、进出口、版权交易、演出、教育培训、音乐衍生品等纵向产业链,连接红色音乐与广播、影视、动漫、游戏、网络、硬件播放设备、乐器生产等横向产业链,逐步形成上下游相互呼应、各环节要素相互支撑的湖湘音乐文化产业综合体系。推出一批经典音乐作品,催生一批创新型音乐企业,造就一批重量级音乐人才,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支持长沙积极创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打造红色音乐和民族音乐两大特色品牌。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支持中国(湖南)红色音乐作品数字资源库、数字出版传播平台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实施湖南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出版工程,对珍贵录音录像资料进行抢救性修复与数字化保护。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推动行业组织建设。

(作者单位: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